

# 当代社会需要综合研究

——译《当代社会：社会学的综合分析》一得

谢 平 仄

我们决心翻译美国学者J·佩里和E·佩里合著的《当代社会：社会学的综合分析》一书，因为它是一部颇具可读性和普适性，又富于时代气息和学术特色的读物。其最大特色就是对当代社会进行了综合研究。

顾名思义，该书所考察的对象是当代社会。怎么考察法？这是摆在作者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当然，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停留在眼前。所以书中除设有专章追溯“人类历史开端”（第2章\*），并在以后许多章节回顾了社会群体、组织、结构、制度、文化等由简而繁、由低到高的变迁历程外，还对诸如“经济前景”、“世界命运”等未来课题，进行了种种预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考察必须切合当代社会的特点。正是由于作者准确地抓住了当代社会最为突出的“复杂性”，才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综合探索”的方法。

纵观全书16章的内容框架，不难发现作者所说的“复杂性”，既指当代社会是传统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微观组织与宏观结构、共时态与历时态、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等前后相继、经纬交织、内外联系、有血有肉的有机统一体；又包括当代所面临的一系列愈来愈紧迫的全球性课题，如：社会变迁、人口剧增、生态失衡、现代化与都市病、工业和失业、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秩序、国际环境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方方面面。人们要想理解如此多元、多层、多维、多变又日益开放的当代社会，无论就知识准备或方法应用而言，都不是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的。为此，本书第1章作了较集中的探讨。其中，不只一般地倡导采用区别于传统经验方法的“更为精确而有效”的科学方法（包括：（1）选择研究范围，（2）明确问题，（3）提出假说，（4）观察和记录，（5）资料分类，（6）综合概括，等）；还特别强调需要一种应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相应地提供了涉及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遗传学等众多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的背景知识。作者认为，每一门学科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优势各异，如果只采用一门或少数几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很可能局限于某一方面或少数几方面，难以获取较全面的“客观真实性”。在作者看来，“综合探索”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能使人们“从一种联系的观点中”，“理解我们当代社会的复杂现象”。

本书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在探讨“人类历史开端”这一课题时，广泛吸取了传统学科知识和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新兴学科的新成果。如天文学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气泡

学说”，社会生态学家关于“生命起源的描述”，生物进化论、人类学、考古学等关于人类起源的考证，遗传学的染色体理论，生物化学及群体遗传理论关于“突变”、“基因漂移”、“基因流动”、“物种形成”的学说，以及人种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从不同视角和不同水平上，对天体演化、生命由来、人类发源、人种形成、人性本质等命题所进行的科学论证和合理推测等等。由此得出的以下几点结论，对于认识当代社会（包括当代人）也很有意思：（1）“除了自然选择之外，生物的变异还由基因漂移和基因突变所引起。变异的最终结果是物种的形成”，“人类也必须经历物种形成这个阶段”。（2）“除了隔离的开始阶段，没有一个繁殖群体能长期保持完全的隔离状态。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是杂交品种，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纯种’。”（3）“人类的遗传天性为我们的习得方式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同时，也正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缺陷，使我们很有必要去建立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行为系统。”

这种运用多学科，从多视角、多层面研究当代社会的“综合探索”，显然区别并优于在单一学科方法的分析基础上所进行的那种概括式的“综合”，它更有利于人们完整地透视构成当代社会的个体“细胞”、微观“组织”、宏观“系统”和内外“环境”，从而达到全面把握当代社会基本面貌的目的。

正如作者在第4版“前言”中所写的，本书汇集、评介了众多学科的各种流派，摘编、改写了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第一流的或当今流行的研究成果，关于正在引起争论的问题的报导，或是对新、老问题作出的评论”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所有这些，采取了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并在取长补短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在怎样规定“文化”这一概念问题上（见第4章《社会生活成果：文化》），据引自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Kluckhohn）的统计，见仁见智的定义不下164种。作者则先将“文化”的基本特征归纳为6个方面，试图给它一个复合定义；接着指出：“文化与其说是社会习俗、道德、法律等等的杂乱堆积，不如说是一个模式化的行为体系”；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化是社会成员之间通过相互交往而学到的，共同占有并可以传播的事物的总和”。再如人的“个性获得过程”（见第6章《个人成长：“正常”个性和“异常”个性》），也是一个歧见纷呈、学派林立的课题。书中介绍的有关观点上10种。有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库利（C·H·Cooley）的“照镜子”说，米德（G·H·Mead）的“符号互动”说，弗洛伊德（S·Freud）的“心理动力论”，新弗洛伊德派荣格（C·Jung）的个体无意识外尚有“集体无意识”、阿德勒（A·Adler）的对个体具有刺激力的“自卑意识”、霍妮（K·Horney）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会导致一种病态的需求”、弗洛姆（E·Fromm）的“人人都有最基本的个体需求”，皮亚杰（J·Piaget）对个性形成的“发生学”研究，以及行为主义和环境决定论的有关论述，等等。作者一一做了基本不带偏见的叙述，又没有陷入客观主义的极端，而是如实地指出：“上述个性理论尽管很重要，但只是现有众多理论中的一小部分，这样能使我们这一课题的复杂而缺乏定论的状况有所了解”。并给予适当的评说：“每个理论体系所注意的焦点是个体而非群体，而且各自强调个体的不同侧面，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然后，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个体并不是离群索居的，不与他人接触，个体就不能发展为成熟的人。只有当一个人同他周围的人们发生联系时，他的个性才能得到发展。”这样，不是既能使读者获取丰富的信息，又能把探讨引向深入吗？

引人注目的，还有作者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的那种有一定分析的态度。如在第9章第4节，陈述了“卡尔·马克思关于观念起源于社会环境的观点”之后，作者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我们同意某些社会环境可以有助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同时，无疑人们也凭借对外界的正确认识——意识形态来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可能是触发社会变迁的契机。”在这

里，除了作者未能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的能动反作用是一向给予充分肯定之外，其他论述基本上是能为我们所接受的。当然，在另一些问题上，也有发生误解的地方。如在第5章阐述“社会科学的宗教考察”的第3节，作者认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者；在第9章论及“技术：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动力”的第3节中，又把马克思列入“技术决定论”等。一般说来，作者对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所持的某种偏见，基本上没有用来对待作为理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既有为情理所能理解的局限性，也有能在学术问题上持开放态度的可取面。

其实，客观公允是综合研究的需要，是其中不可缺乏的成分。道理很简单，在综合研究所必然面对的多学科、众流派之中，倘若拘泥于某一学科、学派的观点方法，而对其他抱门户之见，谈何发挥博采众长的综合互补优势？

本书正是由于较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熔百家之言于一炉的综合研究，因而能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一定成果。

第一、尽管作者对美国社会的着笔较多，但整个视野并未以此为限，而是给当代社会的全景勾勒了一幅依稀可见的轮廓。有如书中所写：

——“社会变迁导致现代化”使人类迈向当代社会：“现代化主要是指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整个过程。它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是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当代都市化发展的趋势，是郊区化和大城市化”；“自动化和异化，这是美国蓝领工人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以上分别见第9章、第11章、第12章）

——“在当代社会中，改革和革命这两种社会运动最有影响”：“改革运动是在不改变社会整个秩序的前提下，改变某些现存社会秩序的特征”，“是公民和政府机构修正法律和制度的努力”；“革命运动——现存的社会秩序如此混乱、腐败、不公平，无法加以拯救，以致他们力求完全根除旧的社会秩序，代之以全新的社会秩序——常常必须诉诸武力”，这“既可能是推翻外国统治的民族运动，也可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运动”。（以上分别见第9章、第11章等）

——开放作为“社会流动”、“社会变迁”的加速器，在当代更为显著：“大多数现代工业社会有一个开放的分层制。在开放的制度下，社会流动是可能的，尽管有些成员因为地位低下，没有权力和财富，因而没有机会去实现他们的潜能”；“对于那些在地理环境上处于各种文化相交的十字路口的社会来说，其变迁就会发生得持续而迅速，因为这些社会文化之间是互相开放的。相反，变迁却很少在那些地理上相对闭塞的社会中发生，因为它们几乎没有机会进行文化的传播”；……。（以上分别见第7章、第9章）——应当说明一点：一个社会的开放或封闭，并不完全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还有本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状况、现实程度（包括交通、运输、通讯等等的发展水平），以及内外政策等制约因素。

——“大规模的组织以及相应的科层机构，是我们当代社会的特点”：“社会控制，由于社会规模扩大和日益复杂，而不能再在家庭（首属群体）的基础上施行”；“依赖次属群体，重视社会机构的作用”是“现代工业社会具有”的“特征”；“科层机构一般抵制变革，它使规则如此刻板，以致目的和手段却变得模糊起来，它挫伤个人的积极性”；“科层机构的动态发展，足以适应变革和推进社会革新”；……。（以上分别见第12章、第14章、第3章等）

——“没有一个社会采用一种纯而又纯的制度”：“实际上所有经济都是某种程度的混合经济，其中混合程度决定了经济制度的形式”；“市场机制能够产生这样一种经济功能：所有个人都能得到他在一定条件下应该得到的满足”，但“并不是所有通过市场机制取得的结果都

是与我们的社会目标相一致的”，所以“大部分市场经济必须接受公共权力的干预，使经济的运行产生明显的选择”；……。（以上均见第13章）

——大众传播信息的兴起：“本世纪的传播技术发展如此之快，使得今天的世界与上一代经历的世界大不相同。一方面，我们连续不断地受到大众媒介的包围；另一方面，我们所获得的知识的力量给我们造成威胁，并使控制着信息的人有可能只把那些他们想让人知道的信息传播出去，这样我们便陷入新的问题之中”；……。（见第11章）

——人口发展的新趋向：“马尔萨斯的预言同发达国家的现状几乎不相干，但是它可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那里人口增长超过粮食生产”；“人口统计转换模式认为，社会将由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走向低出生率，最后达到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当西方社会已按此模式发展时，是否所有的社会将会这样，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见第10章）

——人类正破坏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是全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因素，却在不断破坏它的平衡。我们需要超乎寻常的技术发展以避免资源耗竭，同时需要用巨大的努力保护环境，使其免遭污染”；……。（第10章）

——各国迫切需要和平共处：“在世界各国学会和平共处地生活以前，核军备竞赛有毁灭世界之势。但是，主张冻结军备的群众运动或许还能防止这场灾难”；……。（第14章）

第二、描述了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性。这些散见于全书的认识，大都是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值得一提：

——“尽管世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但是也有某些一致性和相似性，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有规律、有秩序而且合理的模式。这些相似性的存在，成为我们分析研究问题的基础”。（第10章）

——“我们都必须服从一定形式的社会控制，社会的生存依赖于控制的水平及其提供的凝聚力”。（第3章）

——“孤立的个体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不能形成自己的个性，甚至也不能意识到自我的独一无二的存在”。（第6章）

——“偏见是对一个少数群体、或者个人抱有定型的、未经证明的信念。歧视是根据偏见信念而产生的行动，这种行动否定一个少数群体成员有平等机会得到财富、权力和特权。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歧视，而制度上、结构上的歧视是最难排除的”。（第8章）

——“社会或社会结构的变迁是通过计划、改革和革命的途径实现的”。（第9章）

——“抵抗变迁的运动，目的在于阻止或根除社会变迁，只要社会出现新的改革，就会出现这种抵抗运动”。（第11章）

——“当一个社会的现代化以渐进的方式在几代人之间发生时，它最终会被现存的社会秩序所接受；但在那些试图超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里，这种相互的适应就很难发生，它的结果只能是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其他形式的混乱”。（第9章）

平心而论，这些观点并非本书作者的独创，也很难说是完美无瑕的至理名言。例如，固然可以合理地将“改革和革命”视为实现社会变迁的途径，但是把基本属于主观范畴的“计划”和属于实践范畴的“改革和革命”都作为实现社会变迁的途径而加以并列，则未必贴切等。不过整个说来，上述各点所包含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还是显而易见的。

附注\*：以下所写的各章编码，是按本文作者主要译著、即将由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社会：社会学的综合分析》一书的编排次序注明的。